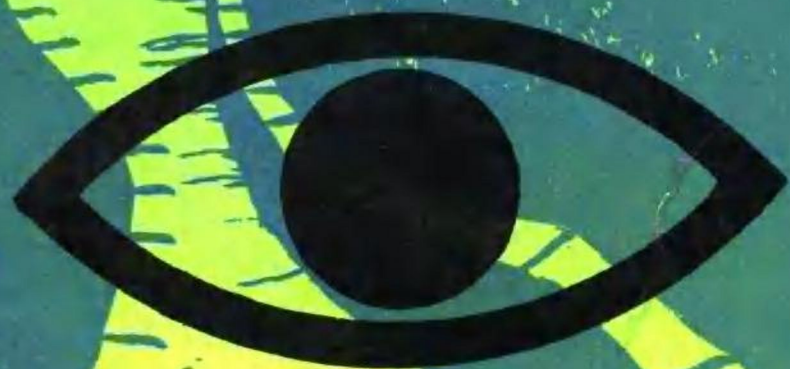


徐均平 编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十六世纪欧洲人 研究中国

07.8

(甘)新登字第08号

十六世纪欧洲人研究中国

徐均平 编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625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96千字 印数: 1—1000

ISBN7-311-00474-8/K·57 定价: 2.31元

序 言

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西学东渐”而形成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接触的高潮，多年来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著作颇丰。就其研究的内容来看，多为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如何接受西方文化、欧洲文明如何传入中国。至于外国人在当时如何研究中国、他们对中国认识到了怎样的程度等方面则文学寥寥。其实，明清之际在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欧洲人也在研究中国。

欧洲人把中国问题作为一门学问进行全面系统并较为深入地研究始于十六世纪。虽然前此也曾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甚至著述在欧洲流传，然而那些都不过是一些旅行家的记录或传闻。它们在中西关系史上的作用远不及十六世纪欧洲作家对中国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来得深远。

十五世纪末，西欧封建社会已到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已有相当的发展。西欧社会进入了所谓原始积累阶段。恩格斯对这时期的西欧社会状况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十五世纪末，货币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到何种程度，可以从欧洲这一时期对黄金贪求无厌的心理中看出来。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

的东西”^①，正是为了积累资本，向海外进行掠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殖民主义先锋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开始了向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扩张。他们兵分两路——西班牙西，葡萄牙向东，然而殊途同归。最后，这两股殖民侵略的浊流在亚洲汇合了。这一汇合绝不是偶然的。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南下，穿过印度洋到达亚洲，是为了寻求东方的香料与珍宝。西班牙殖民者横穿大西洋的目的也同样明确。哥伦布就说过他“要尽一切可能到那使我能找到黄金和香料的地方。”^②

在殖民扩张活动中，西欧殖民者从来都是刀剑与十字架并用。在凡是以武力能够征服的地方，他们从不吝惜子弹。在美洲、印度、菲律宾就是如此。在中国，他们也曾多次以武装进攻骚扰中国的边境。如1514年，葡萄牙曾派遣若热·阿尔发累斯率领舰队侵入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并在岛上勒石为志。^③这批侵略者后被广东海道汪铉率师驱逐，击毙其顽抗者，缴获洋枪二十余只。1522年葡萄牙舰队又在末儿丁·甫思·多·灭儿率领下到达珠江口海岸，并入寇新会县西草湾。广东水师再次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④而在以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见《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第9页。

② 《哥伦布航行，日记、书信和文件》，莫斯科，1956年版，155页。

③ 参见刘建《十六世纪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的演变》《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

④ 《明史·佛郎机传》。

武力无法征服的时候，西欧殖民者便以传教士为先锋，以传播文化知识为手段去开辟他们前进的途径，进而达到他们用刀剑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十六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是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渗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整个十六世纪是西欧殖民者对海外进行大肆征服的时代。自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以后，西班牙人于1512年征服古巴，1519年征服墨西哥，1531年占领秘鲁。随后智利(1536年)、哥伦比亚(1538年)、阿根廷(1549年)及巴拉圭、乌拉圭等也相继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初侵入印度，1502年炮击卡利库特。此后又占领加纳诺尔和科钦，建立要塞。1509年葡萄牙人击败了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舰队，扩大了在东方的势力，遂乘胜于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攻占马六甲，并在科隆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建立了商栈。

西方殖民者在被他们征服的地区极尽杀戮之能事，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令人惨不忍睹的一页。欧文在叙述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次屠杀时写道：西班牙人的“步兵分成小分队突然从各方面向前推进。敲着鼓，鸣着号，施放着毁灭性的火绳枪。印第安人惊慌万状。军队从四面八方逼将过来。那枪声闪电雷鸣般地爆发出来。许多人被火绳枪的弹丸打死了。在他们混乱到极点时……骑兵队向他们的主要部分猛烈地冲击，将他们压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长矛、大刀把他们戳死、砍死。警犬也被放将出来，向赤身裸体的土人扑去，抓住他们的咽喉，拖倒在地，把他们的内脏撕扯出来。战斗，如果这也算作战斗的话，很快就结束了，被挫败的印第安人向各个方向逃去，哭叫着，有些人攀上了悬崖绝

壁，从那里苦苦地哀求着，答应屈服。许多人被砍死了，很多人成了囚徒”。^①

如此穷凶极恶的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到了中国竟屡攻不进，逡巡而不能入呢？他们面对现实不得不对中国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明代自洪熙之治以后，国家富足，属于当时世界强国。虽到十六世纪由于朝廷腐败，官吏堕落，国势已不如前，但继洪武之余烈，仍不失为泱泱大国。尤其在远东，明朝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十六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经过多方调查，广泛搜集资料，有些人还亲自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强大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据十六世纪的欧洲人调查，明代有纳税人4000万至6000万），武装力量也不可低估（他们估计明朝有步兵400万至500万，骑兵70万至90万）；要想征服这样的民族只能是蚍蜉撼树。正是这种态势迫使西、葡统治者采纳了其“有识之士”的意见，放弃了武装征版的愚蠢举动，而以文化为手段向中国渗透，通过传教打开中国的大门，正如十六世纪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满杜萨所说：宣讲上帝的福音，“这才是切开他们心脏的刀剑”。

毫无疑问，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西学的东来，西方科学技术传到中国。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几何原本》、《同入算指》、《测量法义》；龙华民的《地震解》；熊三拔的《泰西水法》；日耳曼人汤若望的《西洋测日历》、《远镜说》等都为中华科学技术的发展

^① 欧文：《哥伦布·他的生平和他的航海》，纽约，1905年版194页。

做出过贡献。他们在研究中国的同时，把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也使欧洲人大开了眼界，丰富了欧洲人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绝不是早期西欧殖民者的本意。对于产生这样的积极效果，我们只能说是殖民者们在他们侵略与渗透的活动中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400多年前明帝国以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功地遏制了早期殖民者的武装入侵，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教士为先锋，以传播文化为手段同中国接触，从而导致中西文化交流高潮这一历史片断，对我们正确理解与处理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益的。

徐均平

1991.10.22

目 录

第一章 在葡萄牙人的帘幕背后(1520—1550)	
.....	(1)
第二章 中国满杜萨的著作及其资料来源	
.....	(20)
第三章 “中部王国”	(35)
第一节 政治体制、组织和国家管理	(37)
第二节 经济资源与手工业	(54)
第三节 风俗和学术文化	(64)
第四节 军事、商业与进贡制度	(86)
第五节 对《中华大帝国志》的评价	(94)
第四章 耶稣会士的文字记录及其在华的早期	
活动	(99)
第五章 绘制中国地图	(131)

第一章 在葡萄牙人的帘幕背后

(1520—1550)

在地理大发现年代以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模糊。他们关于中国的概念主要来自一些陆路旅行家们的传说和那具有浪漫色彩的旅行记载。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逐渐了解到在十分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民族，他们能生产丝绸和瓷器，而这些东西是欧洲人无法企及和远远不能成功模仿的。于是这些文学性著作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使得欧洲人难以忘怀了。不过，在丝绸、瓷器等给欧洲人以深刻印象的同时，掺杂在传说的一些无稽之谈又使欧洲人迷惑莫解，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真正是个什么样子。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原始积累的开始，欧洲人对传说中遥远东方的中国变得格外热心起来。因此，在几乎整个十六世纪，在欧洲，人们要求从一个最新观点——即从过去遗留下来的真假混杂的印象里得到一个更为准确、更为清晰的中国的形象。这一有目的的认真了解中国的活动从十六世纪初便开始了。

1497年，葡萄牙人终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从十六世纪初年流传着的东西方商业的往来、旅行及官方报告中，欧洲人对真实的中国已开始得到朦胧的一瞥。葡萄牙的先驱者们在印度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传说，据说在大约80多年前，有一些“白色人访问者”曾定期来到马拉巴海岸一带。关于中国的最确切的报告是葡萄牙人探险的最初十年传到欧洲

的。这一报告说早在明初，中国的探险家们已经做出了穿越印度洋到达非洲的壮丽航行。不过，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及其随后的继承者们对在南洋及印度已发现的黄金及香料兴趣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印度西南沿海各商店里见到的中国出产的其他商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些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带回了里斯本。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欧洲极端的稀少，甚至在印度的商店里也是十分昂贵的。在此之前，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在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中，而在地中海一带则为意大利城市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所垄断。此次达·伽马及其追随者们直接从东方带回了珍稀的中国瓷器与丝绸，这对葡萄牙产生了极大的刺激，葡萄牙的商人与王侯无不振奋。为了更多地获取中国的货物，了解中国的真面目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Manuel I）及其事业心极强的谋士们，开始寻求关于中国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1508年一位叫迪亚格·罗布斯·德·塞奎拉的使臣被葡萄牙派往马六甲进行勘察，他得到的具体指示是：

“你应当寻找中国人，了解他们是从何处来，有多远。他们何时来到了马六甲…。他们所带何种货物，每年来多少船，注意其船的式样与风格…。他们是否是富商。他们是软弱还是好斗，是否有武器大炮，所穿何种服装，是否身材高大，是基督徒还是信仰多神教。是否是大国，是否一国之内有诸多王国。他们中间是否有摩尔人或者在信仰上、法律上与他们不同的其他民族居住。如果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仰什么，崇拜何物，该国是朝世界的那一部分伸延，与何人搭界？”

这位葡萄牙使臣迪亚格·罗布斯·德·塞奎拉所负的使命与西班牙殖民先锋哥伦布穿过大西洋向所谓的印度与中国的远征略有不同。哥伦布与西班牙国王达成的所谓圣·达菲协定公开表明哥伦布首次西航的目的是以武力占领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财富，建立殖民统治机构。然而如果细究一下塞奎拉东来所负的使命，其同哥伦布远行的最终目的的类似便可一目了然。这就是塞奎拉应在马六甲一带查清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人口素质以此作为葡萄牙进一步对华殖民入侵的依据。从货物的多寡，质量的优劣，船只的多少及造船技术的高低以及人的服饰大体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至于是否身体高大，软弱抑或好斗，有否武器或者大炮则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战斗力及军事实力有关。如果纯粹为所谓圣教的传播或友好的贸易，似无需派专使对这些方面进行特别了解。至于中国是否是大国，是否国内有诸多王国，以及是否国内人民在信仰、法律方面各不相同，这更与西方殖民者未来的对华政策有直接关系。中世纪的西欧，一些国家如德、法、意大利等内部诸侯林立，割据一方，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国家或政治势力总是彼此利用别国诸侯反对其国王或皇帝以达到掠夺别国领土、财富的目的。所谓摩尔人乃是8—13世纪占领比利牛斯半岛的柏柏尔人的后裔，与西、葡两国本是宿敌。如果中国这一美丽的地方有摩尔人居住，也许欧洲人未来对中国加以征伐会更加“师出有名”了。然而中国毕竟是经济发展、幅员辽阔、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防力量强大，统治制度严密，欧洲人要搞清楚上述问题岂是一朝一夕之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并向中国渗透，欧洲人不得不花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此后不久，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数量不大的贸易便开始了。也就在此时，这些来自露西塔尼亚的探险家及商人们开始从海陆两途勘察通往中国华南的路线。在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有时独自探索，有时则找一些中国人伴随着一起进行。至于他们如何从陆路寻找通往中国的路线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大多数葡萄牙先锋们都是乘平底帆船（舢板）向中国航行的。其中商人们迅速地发现，如果“把香料从马六甲运往中国会获得极大的利润，如同把这些货物运往葡萄牙一样。”^①而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则源源不断地被运往里斯本。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们也开始购买其他商品卖往欧洲，譬如有一位名叫乔治·阿尔瓦利兹的商人——据说他于1514年做了第一次葡萄牙人有记录的到中国的访问——就曾购买桐油之类（此后葡萄牙人亦仿效中国人的用法，把桐油作为油漆涂到船上防腐）。不过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状况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商人努力向中国渗透的消息，在他们开始进行这些活动的初年并没有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葡萄牙人采取了“保密政策”。他们企图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设置一道帘幕，挡住其他欧洲人的视线从而独占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贸易。当时整个欧洲对中国的无知也与当时中国本身设计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按明政府的政策，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所遇到的中国商人与水手是非法出境的。（在1397—1398年制定的洪武皇帝的大明律中规定，为了国

①引自弗格森《广州葡萄牙囚徒来信》一书，（载印度文物工作）1901年第三十期P423，本引文摘自安伏里亚·阔萨里于1515年1月写自马六甲的信，该信1518年首次发表于佛罗伦萨。

家的安全和利益，炎黄子孙被禁止无论是从陆路还是从海路出国。官方规定凡私自出国并泄露有关国家安全之机密者处死刑。然而明初皇帝反对向海外冒险的一系列禁令很快就被其后继者们所摒弃）。在15世纪初的25年里太监郑和及其他一些海军军官们就率领了庞大舰队进行向西、向南的官方远征。中国的商人们，即在卡利库特和锡兰人们所见到的所谓“白色人”，同时也访问了印度洋上的许多其他港口。当时马来半岛港城马六甲的建立大大地便利了明朝海军的活动，它成了明朝海军的海外基地与战略港口。明朝向海外探险的事业于1433年被正式禁止，随后几年朝廷公布了一系列禁令，恢复明初的锁国政策。此后中国主要把海军用于保卫自己的沿海城市以抗击倭寇、当地海匪以及后来葡萄牙海盗的袭击。如果明朝海军仅用于守卫海防，其力量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蒙元势力的复活成了明廷于16世纪关心的头等重大问题。因而它不得不集中其注意力应付北方被威胁的边界。这样，华南的海军及沿海防御设施只能流于失修与毁坏的境地，于是十六世纪明廷就很难成功地维持其孤立政策或者在东南沿海保持严格的和平与秩序。这种态势为西方殖民者逐渐向中国渗透带来了一线希望。

嘉靖年间（1522—1566），是中国海上势力衰落和官方停止与广州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的时期。海上势力的衰落使得海盗活动猖獗，而官方贸易的禁止又使违禁的海外贸易扩大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地方官吏对中央政策的阳奉阴违有关。因为尽管明廷坚持闭关的孤立政策，但沿海某些港口，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的某些商人却不顾禁令，私下里进行对外贸易和沿海贸易。据葡萄牙人的陈

述,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在16世纪的上半叶,广东的几位总督竟秘密发放许可证给想到南方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们。因此,即使在明朝闭关锁国时期,葡萄牙人也没有中断对华贸易及对中国情况的了解。

第一个正式的葡萄牙派往中国的大使团是1517年由马六甲来到广州的。按照当时一位名叫巴托罗缪·波列斯特莱罗的葡萄牙人所说,他们已经知道“中国需要和平与友谊”。在出发来中国之前,该使团团长托米·玻里斯(Tome Pires)向里斯本发回了葡萄牙人在整个东方进行贸易活动的详细摘要,报告了关于中国、琉球、日本等“东方诸民族之状况”。玻里斯在他的报告里称他已经清楚地理解了中国官方禁止国人出海的原因,懂得了存在于东南亚各君主与北京之间的隶属关系以及中国人接待外国使节的习俗。

事实上,玻里斯并没有真正理解海外藩邦与明中央政府这一隶属制度的细节。关于这种制度的详情,只是到了现代西方学者才开始清晰起来。根据他那一点有限的情报,玻里斯根本没能充分明白他那时代藩属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正如闭关锁国的政策一样是旨在维护明帝国的安全,防止其财富的外流并限制那些对中国称臣服从皇帝命令的小国进行国际交往。藩邦的使者只能根据北京所规定的条件才可以来到中国。朝贡使团的有些成员可以在边疆城市进行贸易或者按规定的路线到某些内陆城市、甚至在北京进行贸易。但明朝绝对不许外国人在中国无限期逗留或者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谈判。允许他们来华朝贡乃是天朝的恩赐。这就是葡萄牙使者们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所碰到的有关明朝进行国际交往的规章制度。这与他们在别处如印度、马六甲等地所遇到

的截然不同，故而他们对在北京将碰到的接待方式几乎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

托米·玻里斯率领舰队于1517年到达广州，随即派代表上岸联系。经过一番磋商之后，广州地方当局给他们指定了一处住地，令他们等候进京的批准。玻里斯及其随员在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在1520年春得到允许，于是他们出发到北京去，7月到京。因为皇帝出巡，他们一直等到1521年2月还没被召见。这期间政治空气急转直下地对葡萄牙人不利了。玻里斯等人北上以后，逗留在广州的葡萄牙商人和水手们在中国南方沿海胡作非为，这消息传到北京，于是这些在京的“代表们”受到了明廷的猛烈谴责。与此同时因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而遭放逐的马六甲苏丹亦派了一位使臣来到北京向明廷诉说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暴行及该苏丹在葡萄牙强盗手中所受的痛苦，这一情况在明廷引起强烈反映。正德皇帝于1521年3月驾崩，他没有接见玻里斯。葡萄牙使者被命令离开北京。玻里斯一行于1521年9月返回广州。到广州后他们发现原来曾与葡萄牙人做过生意的广州人对他们变得极端仇恨起来，并谴责他们大量偷拐儿童运出去当奴隶。

中国官方对这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在中国进行破坏劫掠活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于1521—1522年开始实行的禁止一切对佛郎机人的贸易(包括法国人、葡萄牙人及所有欧洲人)。同时在广州将玻里斯及其随员逮捕并没收了他们准备献给皇帝的礼物。此后这位葡萄牙“使节”及其随员下落不详，可能在中国渡过了他们的余生。其中有两名葡萄牙囚徒即克里斯塔瓦·维拉(Cristavao Vieira)和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成功地发出了几封信,这些信显然写于1524年。他们企图让其同胞知道他们的命运并敦促葡萄牙国王对中国进行军事远征^①。

这些信件作为原始资料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16世纪上半叶西欧人对中国生活的首次目击记录。这些信件大约于1527年前后到达欧洲,并且在16世纪后半叶所出版的关于葡萄牙人在东方活动的大量编年史中被直接或间接的引用。维拉的信尤其充满了独一无二的 firsthand 观察所得的信息。因为他是在绕过好望角的海路发现后第一个访问北京并把它的情况反馈回去的欧洲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信中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人在首都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的信息。这也许是在16世纪欧洲人的眼中所产生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譬如他写道:

在北京,对待使节的惯例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些高墙大院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旧历初一被关进去,逢十五被准许去皇宫。有些步行,有些骑着有草制缰绳的驽马。在皇宫前秩序井然地跪拜5次。要两膝着地,头脸直碰地面,然后等着命令站起来。他们要这样在墙外做5次,然后返回,重新进入那高墙大院之中^②。

此外,维拉还向欧洲讲述了有关朝贡制度的其他一些特

① 这些信的副本藏于巴黎国家藏书馆。至于玻里斯及其随员的命运问题仍极混乱,而中国明代史书上尚未发现关于玻里斯这一名字的准确记载。

② 此处所谓5次跪拜,可能是转抄者错把3抄成了5,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转抄者把3错抄为8了。维拉等既到北京等候召见,明朝礼宾司不会不指导他们朝拜天阙的礼仪。

点。尽管由于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胡作非为，明廷不会再接见他们的使者，这些东西对里斯本的葡萄牙人已经失去了意义，但他的忠告还是有助于欧洲人了解当时的中国。譬如他把在广州由翻译为葡萄牙使者所写的介绍信原文的内容告诉了葡萄牙人，目的是让他的同胞知道按照明朝的礼仪致书于天子应有的规矩。他告诉他们和中国人打交道表里不一是不行的。他以玻里斯和他的不幸遭遇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即在广州由翻译为葡萄牙人代写的卑躬屈膝的中文信在北京被查明并没有准确地反映葡萄牙国王曼纽尔原信的独立语气和高贵姿态，中国官员了解了两封信的风格大相径庭之后，没有允许葡萄牙人参加朝贺庆典而是命令他们返回广州。不过维拉在他的信中相当公允地指出了正德皇帝的态度与其大臣们对葡萄牙人所持谴责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中国皇帝是极为仁慈而又皇恩浩荡的。据维拉讲，皇帝曾对他的大臣们说：“这些人并不知道我们的风俗，他们以后会逐渐知道的。”不知维拉是从何处听到这番话的。不过他所叙述的皇帝的这种态度却是与中国的传统的仁君明主的对“蛮夷”的恩赐态度相一致的。通过这第一手的对朝贡制度的描述，关于向中国朝贡必须恭敬谨慎这一观念在16世纪上半叶逐渐传播于葡萄牙人中了，即中国的国际交往制度是极端的不同于在欧洲所盛行的那种制度。

维拉在信中还谈到他在中国的其他一些见闻，他评论说：这个国家的有利条件在于它的河流；在中国是百川归海。从未有人从北方向南航行，为了使国家的情况不被外人知道，国王禁止这样做。我们所到之处尽是河流。他们有无无数小舟和宽底大船…这些船无需大水即可行驶，从北到南海